

# 仪礼·礼记

人生的法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学颖 著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 仪礼·礼记

## 人生的法度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李学颖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仪礼·礼记:人生的法度/李学颖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ISBN 978-7-5325-4965-8

I. 仪... II. 李... III. ①礼仪—中国—古代②仪礼—通俗读物③礼记—通俗读物 IV. K89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571 号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仪礼·礼记

人生的法度

李学颖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9 插页 3 字数 131,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4965-8

K·1071 定价:17.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出版说明

“国学”一词，如果仅按照语词来解释，“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见1999年版《辞海》）。但如将“国学”作为一个体现中国独特而古老文化的专用名词的话，其内涵则历来未有权威的论断。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著名学者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然而，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议，构建国学的基础为国故，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明确而不变的，那就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我国所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个基础体系如果用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来区分，便是恢弘而灿烂的经、史、子、集四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国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被冷落 after，近来却又以“国学热”的形态兴隆起来。“国学热”，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然而追本溯源，当今的“国学热”与“五四”运动前后对国学的提倡却有所异同。当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就此而言，现在的“国学热”与百来年前一脉相承。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国学提倡，更多地体现于严肃的学理、学术层面上，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却具有明显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有其深刻的底蕴：不仅是学术界，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苦苦地探究，在世界视域的今天，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应向何处去？然而凡

事一经普泛，尤其在普泛以至形成“热”潮之际，便需要一份冷静，以免“热”潮流于浮泛，堕于时俗。在“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潮流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如何走向”的问题。要言之，也就是深化和浅切的统一，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深化，而就表述手段而言，则要求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的浅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暂不必再就“国学热”这一名称的学理性是否科学聚讼不休；重要的是，须从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一方面的营养，来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要言之，有两件事情：

一是精选。即用最小的篇幅，介绍国学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精华。虽然，所谓的“最小的篇幅”只是相对而言，但无论如何，我们这套由三十本左右的小册子组成的“国学基础教程”，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来说，实在是精选到极致了。

二是解读。既用通俗而不失学术内涵的文字来填平横亘在现代汉语和古文之间的鸿沟，更须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作具有世界视域的现代人的解读。

总之，让广大向往国学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更正确地了解国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在初涉国学这座辉煌的文化殿堂时产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个性化的思考，就是我们编撰这套“国学基础教程”的宗旨；而“基础教程”四字，则标志了我们企图将学术性与浅切化统一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努力。

本《教程》的作者，都是于某一经典有积年研究心得的专家；而同时，我们又请作者或其他专家于各书每一章节的最后，给出一至两道思考题，以期多元化地启发读者在阅读各书内容后，再结合其他的历史和当今社会的现状作出自己的思索。这也是我们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这一教诲的礼敬。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国学传统的原味，这套“国学基础教程”也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为四小套。同时为了读者购买和收藏的方便，每套的封面我们也将以四种颜色——绿色（经部）、红色（史部）、蓝色（子部）和灰褐色（集部）以示区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发明，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做的。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具体内容，则请参见每一分部各书封底的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前言

《仪礼》、《礼记》与《周礼》为儒家礼制经典，合称三《礼》，但在先秦，这三种书名都没有。《周礼》称《周官》，《礼记》则尚未成书，那时但说到《礼》，指的就是现在的《仪礼》。

《礼》本来记载的是各级贵族在冠昏（婚）、祭祀、丧葬、朝聘、宴射、军旅等典礼中“登降揖让进退酬酢”程序以及衣著陈设等的礼仪制度。关于《礼》的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周公或孔子。周公摄政期间，天下初定，正是建立各种制度以巩固统治秩序的时候，史言周公制礼作乐，应属可信。但经过犬戎之乱，王室东迁，旧典的佚失错简，在所难免。若为孔子所作，则周开国数百年竟无礼仪制度，或虽有制度却无片简只字流传，似乎都不可能，也与孔子“述而不作”的宗旨不符。鲁是周公封国，特许使用天子礼乐祭祀。略早于孔子的吴公子季札聘鲁，曾遍观周乐，应该说鲁所保存的周礼也较为完备。孔子一向留心历史文献，他少年时，足迹未出鲁国，就以知礼闻名，有人向他学礼，那么他的知识很大程度上应得益于对鲁存周礼制文献的阅读学习。后来周游列国，曾查考杞（夏之后）、宋（殷之后）两地所存夏、殷典籍，认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并把二代的礼与周比较，得出“吾从周”的结论。为了深入研究、掌握周礼，又专门赴周，向担任柱下史的老子请教，解决了古今礼异同的若干疑问，还跟随老子为人家助行葬礼（见《礼记·曾子问》）。此时的孔子已经是精通礼学的大师，采集搜录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周代礼仪制度，《汉书·儒林传》说他“缀周之礼”，即将搜集所得进行整理，编次成书。所以最初的《礼》应为周公主持制订，而由孔子搜辑编定的周代

礼仪制度的汇编。

孔子从中选取了士必须学习掌握的十七篇，用以教授弟子，这个选本称为《礼》或《士礼》，其中除关系士本身的《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既夕》（士于下葬前夕最后一次吊哭）、《士虞礼》（士父母葬后的安魂祭）之外，《乡饮酒礼》、《乡射礼》是乡大夫为荐士（或岁终祭祀养老等）举行的礼，其他《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多为要士承担任务的礼，如诸侯国之间交往的《聘礼》，士往往担任使者的副手或司仪，其他诸礼的司仪一般也由士担任，孔门弟子公西赤的志向，就是做这样的司仪；《丧服》则包括各级贵族在内。秦焚书坑儒之后，汉初儒生们都凭记诵传经，传礼者为鲁人高堂生，所传就是《士礼》。汉武帝时，发现了孔子旧宅壁藏经书，礼经有五十六篇，因是古文大篆书写，称为《礼古经》，内十七篇与《士礼》文字相似，另外的三十九篇，据《汉书·艺文志》说，“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可知即是原有的《礼》。王莽时《礼古经》还曾一度立于学官，但那时隶书通行已久，儒生们既嫌篆文难读，又无师授，不被重视，东汉以后又逐渐散佚失传。今天《仪礼》所保存的，也就只是与士有关的十七篇了。而在《礼记》的《王制》、《玉藻》、《丧大记》及《礼器》、《杂记》等篇目的部分内容中，还可以看到某些关于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零星礼制，其中有的可能出于汉儒的增益附会，有的就可能是接触过《礼古经》的儒学传人在讲授时举出补充的。

孔门弟子和此后的礼学传人，在传授《士礼》经文时，常常作一些解释发挥，或举古今事例以资说明，称为“记”。《士礼》中有十三篇附有“记”，当是最早的。到西汉时，“记”的积累已很丰富，《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记》一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等，《记》与《王史氏》下分别注有“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七十子后学者”字样，可知这些都是儒家礼学各派代代传习、汇辑和发展的“记”，只是作为讲授《士礼》参考之用，还没有独立成书。这些“记”由于师承同源异流，相互间重叠交错必多，试举一个较简单的例子：

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

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隆礼，谓之有方之士。

——《史记·礼书》

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

——《礼记·经解》

二者文字小异而句次、繁简不同，太史公全录《荀子》，《礼记》所收，则不知是哪一家（可能同出荀子学派）的“记”了。

《曲台后仓》是汉宣帝时学者后仓在曲台设帐授徒时讲解《士礼》的记录。后仓的弟子戴德、戴圣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即各自对礼学诸派所传的“记”，删繁去复，编了一个选辑本，作为自己讲授《士礼》使用的资料。二戴是叔姪，人称大小戴，所以戴德的选本名为《大戴记》，收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戴圣的选本名为《小戴记》，收四十六篇（东汉马融增《月令》、《明堂位》及《乐记》各一篇，共四十九篇）。想来类似的选本，在二戴之前之后应该还有不少，但经过时间的淘汰，却只有这两本留存了下来。东汉晚期，大儒郑玄分别为《士礼》和《小戴记》作注，于是《小戴记》的地位显著提高，与《士礼》分离而独立成书。此后《礼记》便成为《小戴记》的专称，《士礼》则定名为《仪礼》。

《礼记》虽是选本，因非一时一人所作，内容仍很庞杂，前人曾就其篇目进行过多种归类，可见区分之难。从与礼的关系上看，除前面提到的有关礼仪制度的补充增益外，似乎可以粗略地划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仪礼》相应篇目的解说，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祭义》、《经解》等；二是对礼的论述探讨，主要见于《礼运》、《大传》、《哀公问》、《仲尼燕居》等篇；三是阐述儒家有关政治、哲学、道德、修养、教育等观点的，主要见于《大学》、《中庸》、《学记》、《儒行》、《表記》、《缁衣》等篇；《乐记》则为现存最早的专论乐理之作。《礼记》自成书以来即为儒家经典，唐代三《礼》并列于九经，南宋又去掉《周礼》、《仪礼》，只留下《礼

记》，而且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单行，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这就是常说的“四书五经”，历元、明至清，均为朝廷开科取士的必读书。

原来附着于《仪礼》的《礼记》，何以能超越《仪礼》而成为古代正统的最高标准经典呢？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也就是说，《仪礼》只有“怎么做”，《礼记》才讲“为什么’，原因即在于此。

事是具体仪节，具体情况一有变化就不能再用。春秋时周室衰微，各级贵族不愿再受礼制的约束，出现了“礼废乐坏”的局面，连鲁国的卿也不能为两君会见作司仪。孔子志在恢复周礼，逆历史潮流而动，自然是行不通的，齐国政治家晏婴就批评他讲究仪容服饰的区别、进退升降的礼节，繁冗到几辈子也学不全。经历了七国和秦末的战乱，汉初，高祖刘邦和他的一班新贵族多是“草莽英雄”，根本不懂什么礼仪。儒生叔孙通建议制礼，汉高祖说：“要简便些，估计我能做到才行。”因此汉礼大抵沿袭秦礼而更为简易。此后历朝礼制，多本汉礼，而又代有沿革，距离周初制度愈来愈远。唐古文大家韩愈已经苦于《仪礼》难读，又沿袭不同，不可能恢复，“考于今，诚无所用之”。宋朱翌也说今人家宅居室、衣服用具都与古人不同，平时对古礼又一点不了解，因此“三代之礼，不可行于今”。中古以来，《仪礼》仅由于对研究先秦的政治、社会、典章制度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成了专门学问，而几乎已完全与现实绝缘。

理是精神实质，只要产生这个“理”的基础不变，总能适用。通过芜杂分散、不尽一致的资料和论点，可以找到《礼记》从《仪礼》的无数繁节缛文之中提炼出来的核心精神，这就是基于宗族伦理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条总纲，由此派生出各种亲疏尊卑贵贱的人际关系和相应的道德标准，应用在直系血亲间是“父慈子孝”，在旁系血亲间是“兄良弟弟”，在婚姻上是“夫义妇听”，在政治上是“君仁臣忠”，在社会上是“长惠幼顺”，并据以决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为规范。这些关系与规范调节到最适宜的程度就是中庸。人人不违反自己应具有的道德标准，不逾越自己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就可以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维系住“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的等级制度，符合统治阶层的长远利益。不论社会发

展到什么阶段，统治者都可以依据这个总纲来修改旧规范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礼记》之愈益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礼记》的撰写，总的来说处在中国封建制度的上升时期，有着不少合理因素，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但由于其固有的封建基因，不合理的成分也多，并随专制统治的逐渐强化而日趋明显，其消极作用至今仍需批判防范。《礼记》中还保存了丰富的思想、人文资料，涉及宗族伦理、政治制度、教育方式、道德修养、天人感应、人生哲理、交际礼仪等各个领域，是研究古代文化礼俗的重要典籍。

落笔之始，曾设想过走“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的路子，但如此即偏于《仪礼》而与现实生活距离过远，终于还是从《礼记》所标著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传统社会基本伦理入手，觉得似乎更能追溯今日某些社会现象以至民族心理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脉络。认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 目 录

##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前 言 / 3

### 第一章 礼——文明的脚步 / 1

一、礼从何来 / 3

二、人兽之别 / 9

三、礼与仪 / 14

四、缘人情而制礼 / 23

五、不变与可变 / 29

### 第二章 亲亲——血缘的纽带 / 33

一、孝为人伦之本 / 35

二、事亲之礼 / 44

三、珍重手足情 / 51

四、五服——人伦的集中体现 / 59

五、宗族与家族 / 65

### 第三章 尊尊——权力的表现 / 75

一、君与臣 / 77

二、世卿制及其影响 / 85

三、爵禄与选士 / 93

四、等级的标志 / 100

第四章 长长——宗族外的人伦 / 107

一、敬老与养老 / 109

二、师道尊严 / 116

三、朋友之谊 / 124

四、待客和送礼 / 131

第五章 男女之别——性别的不平等 / 137

一、礼之本 / 139

二、一夫多妻 / 149

三、男外女内 / 156

四、贞淫观 / 162

篇目索引 / 167

## 第一章

# 礼 ◆ 文明 的 脚步

# 礼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明的开始。早期的礼较为简单粗糙，周初封建，制礼作乐，礼制才得以大备。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基础就是由周礼奠定的。《仪礼》、《礼记》是分别记载和论说周礼的专书，历代礼制皆由此发展损益而来。

古代社会的礼，是统治阶层为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而制订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所以能够为人民所接受。合理成分经过历史的梳理沉积形成了传统道德与民族文化。中国五千年屡经变乱而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统道德文化的凝聚力起着重要作用。

礼，作为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制约，在客观上是必须的。社会变革只能以新的制约代替旧的束缚生产力的制约，如果取消或削弱制约，社会就将陷入混乱，甚至引起历史倒退。

本章试图对礼的起源、本质、内容、演化等作一概括的介绍，温故知新，或许多少有助于传统道德的回归与新型道德的发展。

## 礼从何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禮記·禮運》

### 〔原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

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功，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

〔今译〕

大道通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之人所共有，选举拥戴品质好能力强的人担任领导，讲究信实，修致和睦，所以人们不仅仅以自己的父母为父母，不仅仅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使所有的老人得以安度晚年，成年人都能发挥作用，儿童得到抚育成长，鳏寡孤独、伤残病废者能够受到供养，男子各有所业，女子各有家庭。人们厌恶把物品丢弃于地的行为，但并非自己想占有；厌恶有力而不肯出力的人，但并非想要他为我出力。于是一切阴谋暗算都用不着，偷盗掠夺侵扰伤害的事不会发生，因此各家的大门也不用关闭。这就叫做大同之世。

现在大道已经衰微，天下成为各家各姓的私产，各人只以自己的父母为父母，自己的子女为子女，财产归私有，出力为自己。天子国君由子孙兄弟世袭成为制度。修建城郭沟池以巩固政权，制订礼法义理作为纲纪，用以确定君臣名分，深厚父子之情，亲睦兄弟，和好夫妇，订立礼制，划分田界。重视勇士智者，功劳归于个人，因而运用机谋策略，战争由此产生了。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本时代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不是严格遵守礼制的。他们通过礼来揭示道义，成就信实，显明过错，取法仁爱，讲求谦让，以此告诉民众这才是正常的道理。如果有不依礼行事的，即使是有地位权势的人也要被罢黜，被众人视为祸害。这就叫做小康之世。

〔述评〕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素称礼仪之邦，文化典籍，无不说礼；家庭社会，无不循礼。那么，礼是怎么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礼记·曲礼》篇中提到，自从圣人兴起，才制作了礼以教人，人才不同于禽兽。虽然没说是哪一位圣人，但即使是圣人，也只是个体的人。古代礼的方方面面如此之多，程序仪节如此之繁，绝非任何一位“圣人”能够独立主观制订得出来，不过远古传说往往把群众的

创造归在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名下而已。倒是前面所引《礼运》篇的两段经文，为我们描出了礼的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经文第一段，勾画了上古的“大同”社会，确实使人向往。你看：人人各尽所能，劳动成果共有，领导人由选举产生，没有阴谋欺诈，没有窃夺侵害，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图景！正因为“经”的这段描写，历代儒家无不以尧舜时期所代表的“天下大同”为最高政治理想。唐代诗圣杜甫的大志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宋神宗即位之初，颇想有所作为，对王安石说：以唐太宗为榜样如何？王安石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学唐太宗呢？”

这里有一点颇堪玩味。儒家是最重视礼、推崇礼的，《礼记》中随处可见的如“礼本于天”、“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直接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也多处提到如“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不可胜数。然而，在关于这个至美至善的大同世界的叙述里，却连一个“礼”字也寻不到，难道大同世界的“天”与后世不同，大同世界是不讲道“理”的吗？当然不是，也并非圣人疏忽，而是那时还根本没有礼。所谓的大同世界，不过是被高度美化了的原始社会形态，一个空想的乌托邦，一点儿也不值得羡慕。

我们据《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等古籍所记并加上一点注脚，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太古（原始社会）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像兽群般聚居以抵御猛兽长蛇，生吃野果蚌蛤，腥臊恶臭；没有多余的食物养活多余的人，不“各尽所能”就会饿死；没有多余的财物可供“藏于己”（私有）；男女杂交群婚，知母不知父，无所谓亲子关系（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智能不发达，争斗凭力气，要不出计谋；既无私财，又无男女之别，关大门（在“巢居穴处”时期，恐怕连大门也没有）防谁？氏族、部落内部虽然和平共处（讲信修睦），彼此间战斗却异常激烈残酷；部落联盟的大首领由组成联盟的各部落酋长共同推选，并非现在的公民投票。尧、舜、禹就是原始社会末期最后三位大首领。又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墨子》、《韩非子》等书记载尧的生活状况说：尧住的堂屋，地基高三尺，土阶三层，茅草盖顶不剪齐，伐树为椽不刮削；吃的是盛在瓦缶里的糙米饭、野菜豆叶羹；夏天穿葛衣，冬天披鹿皮。这种生活，大概比一般公众也好不到哪里去。至于权力，大首领